

文化转型语境下语言文字 规范纷争探析*

刘楚群

【提要】当代中国正进入一个文化转型时期,多元文化正逐步取代一元文化成为时代特征,近年来语言文字领域的很多争议恰是当代多元文化的表征。科学的语言文字规范理念首先需要一种发展的、开放的、包容的文化心态,其次要科学区分语言文字的工具作用和文化作用,并且,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强调语言文字的工具作用。

【关键词】文化转型 语言文字规范 工具性 文化性

【中图分类号】H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4)04-0102-07

语言文字是每个人须臾不能离开的基本交际工具,也承载着特定族群的文化特质和心理情感,语言文字的合理规范和健康有序发展是社会和谐稳定和发展进步的基本要素。因为语言文字是开启民智的基础,所以社会的变革往往从语言文字的改革开始,著名学者胡愈之先生认为:“西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语文运动为先锋,中国的启蒙运动也是以语文运动为先导。”^①也正因如此,语文运动往往和大的社会运动甚至民族的独立自强运动结合在一起,李宇明先生(2011)认为,从清末到民国,改革语言文字的切音字运动、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等,都汇入到救亡图存的滚滚历史洪流中。^②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交通的便捷,大规模人口流动成为普遍现象,推广规范统一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当今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推广和规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但是,另一方面,当

代社会正处于一个文化转型时期,一元文化向多元文化转型、精英文化向平民文化转型成为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文化转型促使人们重新思索传统上已经接受的诸多观念,有关语言文字的问题尤其是“规范”问题自然成了审视的对象。

语言文字一方面是一种交际工具,另一方面也是人们情感依存的载体,所以对语言文字问题一旦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极坏的社会后果。

* 基金来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词语规范及科学语言规范观研究”(项目编号13BY05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2&ZD173)。

① 周有光:《我的人生故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② 李宇明:《了解世界怎样做语言规划——序〈语言规划经典译丛〉》,《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4页。

屈哨兵(2011)提出,语言问题看起来无关紧要,但它能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一旦处理失当,很容易成为某些人一哄而上、趁机闹事的借口。综观国内外社会发展的诸多事实,由语言问题引起的文化冲突、族群矛盾、社会动荡乃至国家分裂的情况并不鲜见。^①近年来,有关语言文字的纷争非常多,有必要对其做出科学合理的分析,这不仅有理论意义,更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近代以来的文化转型

所谓文化转型是指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替代旧的文化形态,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转型往往是由传统文化转变到现代文化。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变化非常快,文化转型也非常明显。任剑涛(2001)认为,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是一个在事实上勿需再认定的问题,需要的只是在价值层面上加以调适,在规划设计的层面上加以符合中国问题性的构造,在现代性反思的思维进程中加以更适当的定位。^②耿云志(2008)认为:“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其基本含义是指中国文化由古代转化到近代。具体来说,是由基本封闭的,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联系的,定孔子与儒学为一尊的,压抑个性的古代文化,转变为开放式的,与近代民主制度相联系的,自由与兼容的,鼓励个性发展的近代文化。”^③文化转型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是主动转型,即某种文化在历史发展的新陈代谢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进步的文化要素替代或完善旧的文化要素,这样的转型相对比较缓慢,新旧文化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二是被动转型,即某种文化受到外部文化的严重挑战或挤压,从而被迫进行文化转型,这样的转型一方面速度比较快,另一方面新旧文化之间差异也非常大。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一直是在西方文化的挑战和挤压之下发生的被动转型。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传统的手工作坊文化被迫让位于西方先进的现代科技文化,在这

个物质文化转型过程中自然滋生了一种崇拜西方的文化心理。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反思,各种西方的思潮趁势涌入中国,从而出现思想文化百家争鸣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物质文明、科技文化获得了突飞猛进发展,精神文化也进一步与西方接轨,特别是随着教育水平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中西方的交流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大大加强了,从而更好地了解到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教育理念、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社会习俗等等。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文化意识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从而出现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

中国近代以来,应该说物质文化的进步确实带来了生活的方便和舒适,但是精神文化的转型却带来了思想的纠结和灵魂的冲撞。对此,思想界并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普通的民众也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从而出现了文化两难的困惑,一方面钦羡乃至崇拜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美化甚至迷醉传统文化。诚如周有光先生所言,“中国是一个正在勉强进入现代、而又恋恋不舍古代的社会。”^④以我的理解,当代中国,在物质文化方面已经勉强进入了现代,但在精神文化方面还难以割舍古代的传统。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各种文化百花齐放、交相辉映,既有本土文化也有外来文化,既有大陆文化也有海洋文化,既有北方文化也有南方文化,既有传统文化也有现代文化,既有经典文化也有流行文化,既有高雅文化也有低俗文化,既有精英文化也有草根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生存的土壤和空间,每一种文化都想成为强势或主流文化,但在社会大转型、观念急剧变化的时

① 屈哨兵:《广州“撑粤语”事件引发的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1期。

② 任剑涛:《现代性、历史断裂与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

③ 耿云志:《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问题与趋向》,《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④ 周有光:《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2页。

期,任何一种文化都很难压倒其他所有的文化而成为主流文化,因此,当代的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和大众化的基本特征。

二、语言文字规范之争的文化症结

在文化转型的今天,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争执自然在所难免。诚如耿云志(2008)所言: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难以化解的困惑,例如中西文化与华夷之辨的问题,古今文化不同的际遇与民族命运的问题,等等。一部分人已经接受的现代文化,而另一部分人却不愿意放弃传统文化,一部分人向往西方文化,而另一部分人却痴迷于民族文化,二者发生论争甚至产生矛盾和冲突就在所难免了,这也是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基本特征。这种文化的对立和冲突往往不仅仅局限于理论上的探讨,而是常常与具体的社会现象相结合。语言文字因为与每个人都相关,每个人都可以说得上话,所以很容易成为这种对立和冲突的汇聚点,近年来语言文字领域的几场口水仗都与此有关,有的甚至酿成了社会事件。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三件事:字母词风波,简化字问题,而影响最大的当数广州“撑粤语”事件,纷争的焦点都是拿文化说事,其本质原因就是文化观念的差异。

事件一:字母词风波。2012年6月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在正文后面的附注中收录了239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即“字母词”,这件词典学界内部的小事却在文化界产生了一个不大也不小的风波,甚至发展成一场“语言官司”。8月28日,一百多人在北京聚会,声讨《现代汉语词典》收录字母词一事,并说这是违法的,参与活动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敏生、“五笔字型”发明人王永民和翻译家江枫等。^①李敏生表示:“在‘词典’中把英语词汇作为‘正文’,用英文替代汉字,从现实的作用和长远的影响来看,是汉字拉丁化百年以来对汉字最严重的破坏,这是一场历史空前的汉字大动乱。”“这是帝国主

义文化侵略的体现。危及中华文化的安全,适应了帝国主义梦寐以求的搞乱中国文化的需要和目的。这是一场自毁长城的文化内乱,是中国文化空前的灾难。”^②9月6日,主张“《现汉》违法”的李敏生、宇文永权、王永民和《现汉》的修订编纂方江蓝生、厉兵、周洪波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打了一场口头官司。^③事件二:简化字问题。2013年7月15日,香港演员黄秋生在自己微博上发表如下言论:“在中国写中文正体字居然过半人看不懂,华夏文明在大陆已死。”此言一出,立即惹来网友激烈吐槽,继而掀起新一轮“汉字简繁之争”的论战。7月22日,著名语言学家江蓝生教授和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先生应邀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以“汉字繁简之争”为题进行激烈辩论并与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④事件三:“撑粤语”事件。2010年,有广州政协代表建议,在广州亚运会期间,广州电视台综合频道或新闻频道改为主要使用普通话广播,或是在两者的主时段使用普通话广播,广州市政协在网上发布了“广州电视台播音情况调查问卷”。有网友于是发布微博:“呼吁各位街坊,尊重粤语、尊重多元文化的友好人士,到以下网址(略)参与问卷调查!保护母语。”此事最后竟导致广州、香港多地都发生了所谓“撑粤语”的集会游行。幸亏政府处理得当,才没有造成大的事故。

分析这些事例,我们无意贬低事件发起方的主观动机,应该说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们确实是想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多样化的地域文化),但是,到底什么是文化的丢失?汉语中出现了几个字母词就是自毁文化长城吗?简化字就不能传承中华文化吗?这

①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2012-08/29/17164712-0.shtml> (凤凰网 2012.8.29)。

② <http://fangtan.people.com.cn/n/2012/0829/c147550-18867605.html> (人民网强国论坛 2012.8.29)。

③ <http://fangtan.people.com.cn/n/2012/0906/c147550-18939402.html> (人民网强国论坛 2012.9.6)。

④ <http://fangtan.people.com.cn/GB/147553/367000/index.html> (人民网强国论坛 2012.7.22)。

样的观点一方面是因为缺乏对语言文字本身进行科学理性的分析，另一方面是因为对文化转型这一大的社会背景还没有在心理上接受。其实无论是字母词的出现还是简化字的使用都不足以造成文化的内乱，字母词的使用恰恰体现了汉文化的兼容并包性，也是当代文化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汉语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与其他民族语言有交流和融合，字母词的出现是当代民族文化交流速度加快的表现。不仅仅汉语借用其他民族的词语，其他民族语言也要借用汉语词语。《中国青年报》(2013.12.5)报道，英国广播公司(BBC)专门为“Tuhao”(土豪)一词做了一档节目，探讨中文词汇的影响力。《牛津词典》方面也关注到了“Tuhao”(土豪)、“Dama”(大妈)、“Hukou”(户口)等中国热词，并有望明年将其收入《牛津词典》。所以说词语的借用是语言文化交流的结果，说字母词的使用会造成文化内乱有点夸大其词。关于汉字繁简之争的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但早期争议的问题主要是简化的科学性，而近年来拿文化说事的情况越来越多，而且很多非专业领域的人也开始对简化字说三道四。说简化字隔断了中华文化是没有根据的，这其实反映了一种“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文化心理，也是对真正汉字文化不了解的结果。在汉字发展史上，汉字一直是趋简的，这种简化史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古文字学家陈炜湛先生从“内证”和“外证”两方面证明“汉字简化始于甲骨文”。^①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再到隶书、楷书、行书，汉字一直在不断简化，在汉字简化史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觉的、民间的行为，只是到了近代，才开始出现政府参与的简化字运动。简化字的使用不但没有隔断中华文化，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水平，使传统文化向各阶层民众传播成为可能，应该是加速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速度。诚如江蓝生先生所言“繁体字和简化字都是我国人民的创造，一样反映汉民族的文化心理。”“没有人认为隶书楷书替代了甲骨文金文和大小篆就破坏了传

统文化，同样也不能说简化字破坏了传统文化。”“国家不穿对襟、大襟改穿西服不能说破坏传统文化，怎么使用了一些简化汉字就是破坏中华文化呢？”“简化字已经走向世界，对于传播中华文化会发挥有利的作用。”^②广州的“撑粤语”事件也是以保护岭南文化为口号的，但是，在广州电视台节目中增加普通话播报就会消灭岭南文化吗？粤语文化真的就面临很大的危机了吗？很明显这有点夸大其辞了。屈哨兵先生(2011)分析得很好，事件的整个过程可以称得上是以一个“伪命题”起兴，由于各界的广泛关注甚至参与，最终酿成一个“真事件”，其中引出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地分析思考。“文化”可能是本次事件中有关各方人士关注最多的一个词。平心而论，就语言(方言)问题来思考和讨论文化是十分正常的事，无可厚非，问题是说粤语已是一种弱势文化，作为区域文化或者次文化已经渐趋式微，这些判断是否立得住则需要思考。^③詹伯慧先生(2010)认为，普通话不是粤语的敌人，电视台保留相当比例的普通话播音是现实的需要。广州不仅仅是广州人的广州，它是中国中心城市之一的广州，也是国际化的广州。从现实情况来看，粤语是强势方言，始终充满活力，不会萎缩。^④

我们认为，保护文化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文化转型时期，应该秉持开放的文化观念。字母词代表外来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可以有一定的生存空间；简化字承载着大众文化，作为全国通用文字是有法律依据的，也符合绝大多数人们的现实需要，繁体字更多的承载着精英文化，具有一定的使用领域，二

① 陈炜湛：《汉字简化始于甲骨文之说》，苏培成、颜逸明、尹斌庸：《语文现代化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② <http://fangtan.people.com.cn/GB/147553/367000/index.html> (人民网强国论坛2012.7.22)。

③ 屈哨兵：《广州“撑粤语”事件引发的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1期。

④ 詹伯慧：《普通话是粤语的敌人吗？》，《羊城晚报》2010年6月9日。

者并不矛盾；普通话是全国通用交际工具，体现了国家文化，方言是区域性交际工具，体现了地域文化，二者各有其独特价值，体现了国家文化和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抵牾。多元文化和谐共处，这是时代的必然选择，也符合党和国家提倡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方针政策，过分痴迷于单一文化已经不合时宜，打着维护文化的口号而对语言文字问题进行非理性的指责是一种非科学的行为，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并没有好处，甚至可能会使人无所适从，最终导致文化的内核被冲淡被忽略。

三、语言文字的工具性和文化性

语言文字最初始、最基本的功能是用于人类的交际，但当一种语言或文字长期稳定地被某个特定族群所使用时，这个族群就会把某些观念、意识融入这种语言文字中去，并对这种长期使用的语言文字产生某种文化依赖性，从而使这种语言文字具有了特定的民族文化特征，并成为身份认同的标志和情感维系的纽带。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说过，语言，是种族的特征，是血肉关系中最密切、最不容易泯灭的部分。所以，从功能上看，语言文字既具有工具性功能也具有文化方面的功能。李宇明先生认为，语言（也包括文字）职能主要分工具和文化两大范畴，且两大范畴又都有显隐二态。百余年来，中国因语言国情所定，一直侧重于从显性工具的角度规划语言。当今之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已是响彻大江南北的时代强音，语言规划在继续关注语言工具职能的同时，要更多关注语言的文化职能。^①毋庸置疑，语言文字的规范，既要考虑其工具特征也要考虑其文化特征，而在文化转型的今天，科学的认识语言文字的文化特征显得非常重要。

语言文字的文化特征包括什么内涵呢？李宇明先生认为，就文化范畴看，语言（包括文字）既是文化的重要组成，同时也是文化最为重要的承载者，这是语言的显性文化职能；语言的隐性文化职能是起到身份认同、情感依存

的作用。应该说，语言文字的文化内涵是相当丰富的，但如果从语言文字规范的视角考察的话，有两方面文化职能尤其重要，一是语言文字的文化承载作用，二是语言文字的情感依存作用。语言文字本身承载了特定的文化这是不容置疑的，无论是语音形式、语法结构、构词方式、修辞手段还是文字的形意关系，都和一定的民族文化息息相关。比如：汉语音节的声韵两合、声调的抑扬顿挫特征体现了汉民族崇尚均衡对称、追求和谐统一的民族文化心理，^②汉语中为数不少的“不X”、“不X不Y”型词反映了汉民族的中庸思想，^③另外，“君臣、夫妻、官兵、城乡”等复合词的语序特征反映了汉民族的基本伦理观念，“虹”的造字理据反映了汉民族的文化联想心理，“嫂”的造字理据反映了汉民族的长幼有序观念，等等。正因为语言文字融入了特定的民族文化，所以人们往往对自己长期使用的语言文字具有很强的文化依赖性和忠诚度。因此，语言文字的一些大的变动往往很容易造成心灵的冲击并使人产生抵触情绪。一般说来，传统意识强、观念较保守的人对语言文字变化的抵触也强，其接受变化的心理过程也比较漫长，相反，观念转变快的人对语言文字的变化往往很容易接受并乐意提倡。

当代中国，正处于文化大转型时期，语言文字的变化非常快，有些变化甚至超出了很多人的心理极限，所以争论也就在所难免了。近年来很多有关语言文字的争执都与此有关，有人说网络语言解构了端庄典雅的汉语、字母词严重影响了汉语的纯洁性，而有人却说网络语言的出现和字母词的使用正体现了汉语的生机、活力和强大的兼容能力；有人说简化字隔断了中华传统文化，有人却说简化字恰恰体现了当代的大众文化。关于方言和普通话的争执其实

① 李宇明：《和谐语言生活，减缓语言冲突》，《语言文字应用》2013年第1期。

② 张公瑾：《语言的文化价值》，《民族语文》1989年第5期。

③ 沈锡伦：《中国传统文化与语言》，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3页。

就是当代文化转型时期传统地域文化和现代国家文化怎么和谐相处的问题；关于汉语和英语的争执则是全球化背景下怎么处理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问题。由此看来，今天的很多语言文字规范问题的争议其实质就是文化观念差异的争执，或者说是当代社会文化多样性的体现，这种文化多样性恰恰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表征。很明显，在文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这种不同文化观念支配下语言文字规范之争是不会出现让对立双方都满意的结果的，要科学解决这个问题还得正本清源，理性地认识语言文字的工具性和文化性的关系。

工具性和文化性是语言文字的两大特性，但是二者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呢？在语言文字规范问题上优先考虑工具性还是优先考虑文化性呢？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文字则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如果不需要交际，人类的语言文字是没有存在的必要的，所以语言文字产生的初始驱动力就是交际。因此，交际功能是语言文字的最本源的、与生俱来的、而且永远存在的功能，而其文化功能则是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逐渐衍生出来并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的辅助性功能。苏金智先生（1989）认为，审美功能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辅助性的次要的功能，在语言使用中，首先应该注意实用功能。^①比如“抠”，这个词的文化意义就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抠”最初的意义表示提起衣服，“抠衣升堂”（《说文解字》），“扣衣”是古代一种礼节，指见尊长时提起衣服的前襟，以示恭敬，如“扣衣趋隅。”（《礼记·曲礼上》）后来引申为“提起”，如“见殿前有古钟……使数人抠耳（钟耳），力掀举之，无少动。”（《聊斋志异·大力将军》）再后来，出现意义“用手指或细小的东西从里面往外挖”并引伸出“吝啬”这一带有主观情感色彩的文化意义，如“抠门”。很明显，“抠”从“提起衣服”到“提起”再到“往外挖”，尽管其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一直都是指称一个客观的概念，并没

有附加很明显的文化意义，一直到引申出“吝啬”这一意义时，才附加了特定的社会文化语义，表达了特定社会群体对某种行为的否定，带贬义色彩。但是“抠”的贬斥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社会发展，文化观念的改变，又造成了“抠”文化意义的变化，在崇尚节俭的今天，“抠”又产生了褒义的用法。如：

“出门时，能走路就不打车；聚会时，能自己下厨就不上馆子……这样的生活似乎有点‘抠’，但最近不少具有高学历，拥有高收入的都市白领却以此为荣，并自称为‘酷抠族’。这个‘酷抠族’并不等同于‘葛朗台’、‘守财奴’，他们在某些方面精打细算，是为了更加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收入，倡导一种健康的消费观念和简约质朴的生活方式。”^②

所以说，语言文字的交际功能是永恒的，其文化内涵经常会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不会影响其基本的交际作用。

语言文字规范问题既涉及工具性问题也涉及文化性问题，而在当代文化转型时期，文化多元成为时代特征，不同文化之间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所以语言文字的文化之争有时难以调和。我们认为，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前提下，理性地区分语言文字的工具性和文化性并适当强调其工具作用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譬如汉字的繁简问题，有些人认为，简化字不美观，甚至隔断了中华文化的根，应该恢复繁体字，至少部分恢复繁体字。对此种说法，国家语委前副主任傅永和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说，这是把文字的工具性和文化性混为一谈了。傅永和先生认为，汉字在演变过程中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交际工具的方向，作为工具，不管是交际工具还是其他生产工具，

^① 苏金智：《“五四”的语言观及其现实意义》，《语文建设》1989年第2期。

^② 《哈尔滨日报》2008年3月9日。

人们的主要期望就是趋简，越简便越好，就像农具一样，都是越来越简便；二是书法艺术的方向，这与作为工具的发展要求不一样，作为书法艺术，要求汉字保留传统的结构、笔势、黑白度等越充分越好，这体现着我们汉民族的审美观。书法和交际工具不可混为一谈，书法上按交际工具的要求是不行的，但交际工具也绝不能按书法的要求，汉字越来越符号化是其作为交际工具的必然要求。^①同样的道理，对于字母词和网络语言等，如果我们认识到它们首先是一种交际工具，从方便交际的角度来考虑其规范时，我们就会在语言内部就事论事，而不会把强烈的民族情绪和文化情感带入语言文字规范中来，这样有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关于字母词的工具价值问题，邢福义先生（2013）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当今信息化时代，全球的联系和沟通已经离不开英文字母词，比如电子邮件的发件人和收件人都是英文字母词，但我们不能拒绝。我们可以把英文字母词看成是一支外来的特种生力军，让它配合汉语汉字，发挥其特定的作用，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语言本质上就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②普通话和方言作为基本的交际工具，二者各有不同的生存空间和使用范围。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为全国人民服务，是国家公共服务、教学、大

众传媒、社会公共服务、公众交流的语言，方言为某一个地区的民众服务，是家庭语言、乡土语言，二者各司其职，各展其能，满足各类人群的交际需求。在市场经济发达、人口流动快的今天，方言区的公众传媒、公共场合使用普通话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以保护地方文化为借口而拒绝普通话的行为不符合民众的实际愿望和时代的发展需求。

总之，当代社会正处于一个文化转型时期，文化多元是造成诸多语言文字问题争议的根本原因。在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处理语言文字规范问题需要一种发展的、开放的、包容的文化理念，同时要科学区分语言文字的工具作用和文化作用，适当强调语言文字的工具作用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本文作者：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马光

① 2013年9月9日，笔者就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问题采访了傅永和先生，傅先生谈了这一观点。

② 邢福义：《辞达而已矣——论汉语汉字与英文字母词》，《光明日报》2013年4月22日。

The Searches and Analysis of Specification Disputes on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Liu Chuqun

Abstract: Contemporary China is coming into a period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multi-culture becom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imes, edging out monistic culture. A lot of disputes on language and character are the features of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e in recent years. It needs a developmental, open and comprehensive cultural mentality to have scientific specification idea on language and character; then it i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the instrumentality and culture of language and character; besides, it is acceptable to stress instrumentality of language and character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

Keywords: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specification on language and character; instrumentality; culture